



苏正军 著

认识彭燕郊

Ren Shi Peng Yan Jiao

湖南文艺出版社

认识

彭

燕

郊

蔡正军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赠书

认识彭燕郊

苏正军 著

责任编辑：陈新文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5.75

字数:120,000 印数:1—1,000

ISBN7—5404—2322—6
I·1729 定价:12.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序

朱 健

过去并不相识的苏正军君，送来一部他的正准备出版的书稿：《认识彭燕郊》，希望我写几句话。这是无法推辞的。因为若以读其诗，知其名即称“认识”的话，我之“认识彭燕郊”既长且久，指数以计，六十年矣。况且同处一城，声气相求，濡沫相煦，已半个世纪，自有不止一次说过又总是说不完，很想一说再说的话。再则，苏君自我介绍，他现在的社会角色为公众看好的律师，自驾桑塔纳从株洲专程直抵寒舍，盛情着实难却。进而想到苏君生存状况，其业也专，其活也累，怎么会不计人生成本地高投入，写这么一部既非“显学”，又决不会成为“热点”、“卖点”的书？其间或有故事，足资谈助，兼广听闻，乃请苏君为我一道。

苏君道来，话并不长，“故事”也没啥耸人骇世的情节悬念或隐私秘密。但在我听来，却颇有“入胜”之感。原来时间差虽在半世纪之上，苏君与我之“认识彭燕郊”却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未知其人、先读其诗，亦即作为彭燕郊诗的读者开始进而心向往之，借句名言，也可称为“但愿一识韩荆州”吧。所不同者，彭燕郊的诗伴我经历过烽火硝烟，风雨沧桑，无论其旧作新品，读来常为亲历其境，亲与其事，亲感其情。苏正军这一代人读之，想来当会隔着一层。大概为偶然误入桃源，不意间与奇山大川、美景佳丽相值。于是怦然心动，遂兴寻幽探

胜之趣。孰料这边风景独好，沿溪行，竟然忘路之远近，掇拾缤纷落英，检点嵯峨怪石，囊储厘积，久而遂成一卷书。这在日日辩黑白、竟是非、权得失、较利害的律师行中，大概是绝无仅有的吧。

再想一想，说苏君读彭诗隔着一层，未必恰当。因为仅是旅游景点式的观赏，欣悦止于耳目，是不可能多年层积土垒致以求的。苏君年甫不惑，社会角色不断变换，从军人、机关干部、公司老总等等直至现在的律师。下海上岸，摸爬滚打，彭燕郊的诗，在他如一幅画卷，随其浮沉悲喜而越牵越长，也可说成了他心灵驿站、精神家园吧。内心必有生命频律的感应，心性幽微的相通，否则是很难如此“执迷不悟”、上下以求的。苏君自称，他之读彭诗，是八十年代偶遇《过洞庭》开始的。前此，他不知道中国有一个写诗的人名彭燕郊，也不知道此人写过什么诗。但《过洞庭》则确乎使他惊诧不已，叹为绝唱。由此，甚至和同为诗歌爱好者的年轻伙伴，激烈争论不已。当然，闻道有先后，审美在寸心，不可以判断苏君争论对手懂诗不多，档次过低。但可以肯定，苏正军“认识彭燕郊”于《过洞庭》而一见折服，起点甚高。因为我一直认为《过洞庭》是彭燕郊最好、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俗谚：洞庭湖的麻雀是经过风浪的。“过洞庭”三字便能传达出一种宏大开阔气象、惊涛骇浪画卷、曾经沧海胸襟；当然蕴积着诗人从历史、人生的“湖底”开掘出来的厚重思考。我曾经说过，“融诗心、大自然、时代(诗的主体、介体与客体)的律动为一体的《过洞庭》，巨浪排空，惊涛拍岸，惊心动魄，水天共震”，大体也是这个意思。与这样的诗不期而至，读诗人即令爱诗如命，无疑也是一种决不轻松的“挑战”。年轻的苏正军居然能把“挑战”化为他“认

识彭燕郊”的机遇，大概只能依靠他自身对诗、对生命的感悟和执着。由此生发，成一卷书，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至于书名《认识彭燕郊》，第一层意思，当然是苏正军研读彭燕郊诗所达到的“认识”。这样的认识，特别是对诗的认识，应了“诗无达诂”老祖宗遗训，是不必强求什么共识、认同的。重要的是作者尽心尽力，钩稽梳理，决不哗众取宠，阿世媚俗，体现出“律师”特有的风骨。书名的另一层意思，则是出于对彭燕郊诗情有独钟，历久弥深，不由得大声疾呼，热切呼唤。可以揣想，多年来苏君每读彭诗，莫不是全身心投入，其通体愉悦，诗美快感，急欲与天下读诗人共享。又常见有人与彭诗或擦肩而过，或视若无睹，遂为之扼腕不已。所以，“认识彭燕郊”的呼声在苏君心底已不知重复过多少遍，逢人便告不知多少回。为今又积而成文章，集而为书卷，以期人间好诗，播远久传，真正是功德无量，善莫大焉。

我算是燕郊诗的老读者之一，衰朽日甚，无益于世。借苏君文稿刊布之机，敲敲边鼓，附和苏君热切呼唤，也吆喝一声：认识彭燕郊！

一九九九年十月七日

目 录

序 朱健 1

第一章 彭燕郊生平及创作简介 1

第二章 彭燕郊艺术风格研究 9

第三章 彭燕郊与“七月”诗人 80

第四章 彭燕郊诗歌理论初探 146

后 记 176

国殊日昇山京区碧县其式，系碧县郊赏不振山郊学已共，命草耕，大鼎神处初一，上进殿工殿对官册，奇光册更京聆除大士，翻学同不长民山。山郊对塔了想升员李固允就求，自平慈西酒真，都直南辛四海在进丁已，求出山同阿波波基酒，被伴多酒风外中，街山妙味。山郊开或，半个多世纪前，彭燕郊的名字就为中国新诗的读者所喜爱。为了给更多的研究人员和读者提供方便，本文着重介绍彭燕郊的生平及创作情况。

一、生 平

彭燕郊原名陈德矩，1920年9月生于福建省莆田市黄石镇的一个地主兼商人家庭，这个家庭到他父亲陈祖宾手里家道开始中落。他母亲一共生育了十二个男女孩子，彭燕郊排行第二，儿童时代在家乡读小学。其父陈祖宾曾在上海、北平等地上地求学，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带回一些新版的儿童读物，这对彭燕郊以后的成长影响很大。在涵江镇和莆田县城读高小时，开始接触新文艺作品，还订阅了上海、北等地出版的文艺书刊，同时也阅读了不少古典小说、诗歌和其它古典文学作品。1932年考入莆田砺青中学，1934年至1938年在厦门集美师范、漳州龙溪师范就读时，得到留日归来的进步教师郑畴帮助，阅读了大量的进步文学作品。左翼作家的作品是他最爱读的，其中蒋光慈的《鸭绿江上》、《少年飘泊者》，洪灵菲的《转变》，叶永蓁的《小小十年》是他接触新文学的启蒙读物，不久，他就开始阅读鲁迅先生的作品，这些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他终身的思想指针。少年时代，他已倾向

革命，并与学校的地下党取得联系，尤其是学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后更加兴奋，把它抄到了墙报上，一时反响很大，搞得校方很恐慌。1938年初的一个夜晚，他与另外三个同学踏上了投奔新四军的道路，在闽西参军后，张鼎丞司令员召见了他们，和他们谈话，使他们倍受鼓舞。彭燕郊等四同学的出走行动惊动了当时的福建省教育厅，他们立即通令全省，永远开除彭燕郊等的学籍，永远不准任何学校录取他们。彭燕郊来到新四军后，先分配在第二支队政治部宣传队，部队由闽西开赴皖南前线，后调到新四军司令部战地服务团。新四军机关报《抗敌报》创刊，发表了他的诗作。1939年调到新四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不久因肺病住进后方医院治疗。1939年秋，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以第一篇的重要位置刊登了他的诗集《战斗的江南季节》，引起了普遍的注意。接着新四军机关刊物《抗敌杂志》也陆续发表他的诗作。1940年5月因国民党军队开始对新四军实施军事包围，形势紧张，在疏散人员的时候，组织上派政治部秘书黄敬找他谈话，尽管彭燕郊反复要求留下来继续战斗，但黄敬告诉他组织上已经决定让他到浙江金华去。当时，东南地区文艺工作由邵荃麟同志领导。聂绀弩、辛劳等已先一步来到金华。从此，他开始了专业文学创作活动。1941年他到了抗战文化城桂林并进《力报》工作，协助聂绀弩编辑副刊《新垦地》、《半月文艺》，主编《半月新诗》，还担任了中华全国文化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常务理事、创作部副部长、诗歌组组长。1944年，日本侵略军发动了旨在打通大陆走廊的湘桂战役，桂林大疏散时，彭燕郊辗转来到重庆，生活拮据，只好将鲁迅编印的《海上述事》、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和《神曲》等幸存的几本珍爱的书籍拿到地下党办的“双

江书屋”去寄售。幸而得到了邵荃麟的帮助，依靠微薄的稿费收入维持生活、参加民主活动，并在《文化界对目前时局宣言》上签了名。

1945年日本投降后，彭燕郊返回桂林，1946年为《广西日报》编辑副刊《现代文艺》、《山水》，担任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桂林分会常务理事，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连续不断地在副刊上发表反饥饿反内战的文章，1947年7月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押了十一个月，在狱中与地下党积极配合，鼓舞狱友同敌人斗争。出狱后不久，于1949年5月潜往香港，后转赴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加入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会后组织上安排他到《光明日报》工作，主编《文学》、《民间文艺》（与钟敬文合编）等副刊。1950年6月应聘到湖南大学任中文系副教授，并担任湖南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常务理事、长沙市文学工作者协会筹备委员会主席、《湖南文艺》杂志编委，主编湖南大学校刊《人民湖大》，《民主报》副刊《文艺服务》。1950年冬和1951年冬两次到湘中、湘西参加土地改革运动。1953年调到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1955年7月刚从武汉参加中南作家会议回来后不久，就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捕，关押二十一个月，被定为“胡风分子”并开除公职。1958年冬在街道上创办了一个木制玩具厂，后改为日用品厂、木工厂。1970年工厂合并到阀门厂当翻砂副工、油漆工。文革期间被抄家六次，关押两次，多年收藏的图书和艺术史图笈被抄走，作品和民间文学资料大部分被毁。“四人帮”被摧垮后，1978年与中国作家协会恢复联系。1979年应邀到湘潭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同年到北

京参加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981年至1983年参加主持民间文学杂志《楚风》的编辑工作。1981年起参加大型译诗丛书《诗苑译林》的规划、组稿、审核工作，编至六十余种，已出版四十余种。1986年起主编《国际诗坛》丛刊。1987年主编《现代散文诗译丛》和《外国诗歌辞典》。1987年从湘潭大学教授岗位退下来后，他克服病痛的困扰，以极大的热情从事现代诗创作的同时，整理了过去的一些作品和论文，如《混沌初开》（长诗）、《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彭燕郊卷》《夜行》（散文诗集）、《和亮亮谈诗》（诗论）等。

二、创作简介

彭燕郊从小热爱文学，学习写作，特别爱好诗歌。在读初小的时候开始写作，写了一些类似散文的东西，有些还张贴在学校的墙报上，后来无论是砺青中学，还是集美师范、龙溪师范，他都是校刊编辑人和执笔人。参加新四军以后，1938年5月新四军军报《抗敌报》创刊，他在上面发表了第一首诗《春耕山歌》，在新四军的队伍里得到了聂绀弩、黄源、东平、柏山、辛劳等人的帮助。1939年冬，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发表了成名作《战斗的江南季节》，同时在新四军机关刊《抗敌杂志》上发表诗作。1940年到金华，后又转赴福建永安，在《现代文艺》上发表《磨》、《殡仪》等诗。1941年到桂林后又在《七月》上发表诗作《风雪草》、《岁寒草》，皖南事变后，他在《七月》上发表了著名的长诗《春天——大地的诱惑》，悼念牺牲在苏北敌后的作家东平的长诗《在这边，呼唤着……》也在这时发表。1943年出版长诗《妈妈，我和我唱的歌》，以及诗集《战斗

的江南季节》，诗集《第一次爱》也在此时编就，聂绀弩为诗集《第一次爱》写的序言，也发表在《文化杂志》上。皖南事变前后，是彭燕郊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他早期的几部长诗都发表在这个时期。

彭燕郊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期是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的那段日子，那时候他为《广西日报》编辑《现代文艺》、《山水》两个副刊（但不是在编人员，因为他不愿充当国民党政权的“公务员”），在各地的刊物上发表了众多的诗和文章，在桂林虞山庙狱中的十一个月里，除了鼓舞狱友们坚持斗争外，就是写诗，整整写了一本诗集，虽然身陷囹圄中，但人民解放的曙光已经在他的心头闪耀。狱中诗《给早霞》、《尤加利树》、《人》等给人们已成熟的印象，有一种内涵崇高、深沉的美感。

全国解放的最初几年，他也写诗，不过他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教书育人及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上去了，他利用到湘中、湘西两次参加土改的机会，带领学生收集民间文学作品，其中较为突出的有《五更阳雀啼》地花鼓演唱集、《湖南歌谣选》等，诗写得少了。1955年后因所谓“胡风分子”被开除公职，直至1979年前后二十五年的漫长岁月里，他写的诗除了以手抄的方式流传外，再也无法发表，这给今天的诗歌爱好者、研究者造成巨大的损失。

自1978年9月在《诗刊》发表阔别诗坛二十五年后的第一首诗《画仙人掌》以后，佳作迭出，诗兴不减当年。像《家》、《钢琴演奏》、《鹫巢》、《小泽征尔》、《塑像》、《陈爱莲》、《过洞庭》等曾引起广泛强烈的反响，这一时期成为他创作的第三个高峰。

作为诗人，有了三次创作高峰已经是十分了不起了。然

而他还不满足,他对自己七旬的高龄满不在乎,仍以青年战士的热情忘我工作忘我创作。参加主持《诗苑译林》丛书,主编《国际诗坛》、《现代散文诗译丛》的劳动非常繁重,但他仍然坚持创作,他这时期作品如《影子》、《瀑布》、《罪泪》、《漂瓶》、《门里门外》、《烟声》等拥有很多读者。尤其是他的《混沌初开》不仅是他个人,而且也是中国现代诗里程碑式的杰出作品。他在艺术上总不满足,每写一首诗总不停地修改、完善,抱定精益求精的态度,总还想达到更完善的境界。当他的这一批新作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使人们感到他又在攀登一个新的高峰。

彭燕郊六十年的创作历程,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时期:

1. 初步探索期(1938~1941)

这一个时期他才从学校走入社会,从地主家庭的二少爷转变为人民军队的战士,又从拿枪的战士转变为拿笔的战士,这一些对于一个二十岁前后的青年说,未免太突然了一些,也许他当时有些应接不暇,但是,他还是很快适应了这一切。这几年,他不仅在寻找自己的生活道路,也在寻找自己的创作之路,这一时期的作品表明了他对多种创作方法的尝试。从《山国》、《雪天》、《岁寒》、《春雷》、《篝火》、《珍珠米收获》等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努力探索的痕迹。

2. 成长期(1942~1946)

这一时期,对彭燕郊震动很大的有两件事,一是皖南事变,一是抗日战争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终于走向了胜利。经历了这两件事,诗人逐渐成长起来,他在时而悲喜、时而痛苦、时而兴奋的情感跌宕中放声歌唱,诗人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有了像《葬礼》、《殡仪》、《安宁婆婆家》、《小牛犊》、《扒薯

仔》、《牝牛的生产》等一大批诗作，构成了他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艺术创作的风格趋向一致，艺术水平不断提高，不仅有鲜明的思想倾向，而且文学性也进一步增强，对于诗歌美学追求也有了比较明朗的趋势，在雄浑、高亢的歌唱中，常常让人进入沉思的境界。

3. 成熟期(1946~1949)

抗战胜利，人们欢欣鼓舞，彭燕郊一时也十分高兴，但在严酷的事实前保持清醒。虽然重庆在谈判，但是在谈判桌上一场血腥的阴谋正在进行，在人们的欢声中夹杂着内战的磨刀声。内战开始后他很快抛弃自己的过分乐观。《叫喊的石块》一诗就充满了“愤懑”、“惊讶”，表示要在沉默中奋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和参加民主运动，他的斗争生活经验越来越丰富，思想感情也越来越深沉了，这些都集中表现在狱中诗集《向前看》中。

4.“沉默”期(1949~1976)

这里说的“沉默”是指政治上受压而言，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1955年以前，彭燕郊的诗作不多，主要是因为他把主要精力投放在教书育人中去了。从彭燕郊诗选中我们所看到的写于这几年的三首诗，《最初的新中国的旗》表现了一个作者如痴如狂的热情，虽然真挚，略显直白。《高兴大妈》和《作家》都可以看成《旗》的续篇，格调比较一致，都是对新中国的热情讴歌，艺术上不如前面的诗，不太为研究者注目。据了解，彭燕郊两次参加土改运动所写的诗至今没有问世，其中表现他对土改的独特看法和独特体验的诗应该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在1955年至1976年的漫长岁月中，诗人因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没有公开发表过一首诗，这个时期，诗人写过

不少的诗,尤其是十年“文革”期间,有不少作品以手抄的方式流传,例如《6.6 惨案》等。从 1949 年至 1976 年,我们能见到的诗太少了,因此,暂时只能称之为“沉默”期,有待于以后这一时期诗人作品公诸于世后再进行研究。

5. 发展期(1976~)

从 1978 年起彭燕郊在《诗刊》上发表《画仙人掌》到近期发表的《混沌初开》以及为迎接新世纪到来发表的《生生:五位一体》都是十分难得的好诗。这些诗以诗人前所未有的气势震慑着读者的心灵,形成了他诗歌创作的新的高峰期,这在老一辈诗人中是并不多见的。

既。《蕙风》山高而见文妙，崇深而富意，清幽而自里共，最秀的处在于其内蕴丰富，其外现于作品中出类拔萃，独树一帜。

第二章 彭燕郊艺术风格研究

已故作家宋文古因病不振，叹曰：“人本是自然风”；曾丰亦言：“学固有三才，风已游其二”。我们对艺术风格研究的痛苦感受是我们对文艺理论研究落后的深刻反思所无法补偿的。落后本身并非十分可悲，更为可悲的是有那么多的人对落后所抱的极其淡漠的心态。文坛的徘徊、诗坛的萧条，难道与我们多年来缺乏真正的深入的对作家对诗人进行热情的批评和关心无关吗？回答是肯定的。

风格在古罗马作家那里最初是为了借以表示某一作家的书面语言的特点的，这一意义在今天仍有“价值”，还有许多作家或研究者持有这种不够完善的见解——语言即风格。西方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风格被用来称谓像雕塑、绘画、建筑等艺术的形式特点，出现了如哥特式、巴罗式、浪漫主义、表现主义、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洛可可的比德迈尔式等等。随着社会发展和时间推移，风格的名称种类远不止这些，以至在西方出现了专门研究风格的“风格学”。把风格上升为一门学科不是徒劳无益的，西方文学到今天仍有这样的势头与此不会无关。看一看我国的文化史，很早就有人提出了一些很精辟的见解。曹丕的《典论·论文》指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即作家的气质与个性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形成作品的风格。早于曹丕的汉代王充曾说“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土之荣叶、皮之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

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超奇篇》）。这么早提出作品的外在形式是作家的内在思想情感的表现，并且内外表里互相影响。古代文论家对作家作品的风格研究促进了我国古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风格是什么？法国学者布丰曾说“风格就是本人”，这如我国古代学者提出的“文如其人”大体一致，不能否定风格与人格的一致性，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另外的一个方面则会告诉我们人格与风格的不一致，甚至相反，风格与人格各有其特定的范畴，它们联系的一面与区别的一面任何时候都会存在。因此“风格就是本人”的判断不是科学的判断，前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 T.H. 波斯彼洛夫也下了一条有关风格的定义，“与内容相适应的形式的各种形象——表现的细节所形成的美感统一体，就是风格”（《文艺学引论》第 456 页），这个定义表明具有完美风格的作品必须具有鲜明深刻的思想上的理解，即具有历史真实性的思想倾向。然而这还不够，还必须建立与内容相适应的完美形式。形式不能落后于内容，内容也不能落后于形式，这样的作品往往具有民族性，也具有某种特定的风格。我们现行的高等院校的教科书中一般都参照了前苏联的提法：文学风格即作家创作的独特标志，它从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的统一中显现出来，并贯穿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这个提法特别强调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却忽视了这种统一在前苏联的提法中是“表现的细节所形成的美感统一体”，这个忽视是对风格艺术本质的忽视。